

#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 及其当代价值

主编 吴 隽

副主编 张茂林 李其江 黄胜辉

#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 及其当代价值

主编 吴隽

副主编 张茂林 李其江 黄胜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0YJC780013)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及其  
当代价值研究』成果

ZHONGGUO MINGQING SHIQI  
TAOCI GUANYAO WENHUA  
JIQI DANGDAIJIAZH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 吴隽主编.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04-044698-2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官窑 - 瓷窑遗址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K87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0161号

策划编辑 张 岩 责任编辑 孙 璐 张 岩 封面设计 张申申 版式设计 于 姣  
责任编辑 刘丽娴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9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上 海 大 学 图 书 网 <http://www.hepmall.com.cn>  
藏 号 <http://www.hepmall.com>  
本 <http://www.hepmall.cn>

次 12月第1版  
印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4698-00

# 序

陶瓷不仅是工业技术产品,也是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反映着不同时代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在长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先民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陶瓷文化。从民窑发展至贡窑,乃至宋代出现的官窑,如北宋汝官窑和汴京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等,反映了不断强化的皇权意志,也代表了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准。

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器)厂更是我国陶瓷官窑发展的顶峰,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专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为满足帝王和朝廷之需,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采用最精细的原料,不计工本,精益求精,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的瓷器,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和技术的巅峰成就,是我国民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瑰宝之一。御窑厂对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在客观上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使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因而,御窑厂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是江西省乃至全国的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2015年2月,宿白等三位著名老专家给中央写信,呼吁加强景德镇御窑遗址的保护与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先后对三位老专家的信件作出重要批示。受江西省委、省政府委托,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朱虹多次召开协调会,并要求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御窑研究院,加强御窑研究,体现了御窑遗址与长城、故宫相媲美的重要文化战略地位。可见,深度发掘和展示以御窑为代表的我国悠久的陶瓷文化,对于响应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陶瓷文化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鉴于明清景德镇御窑的重要地位,相关著述颇丰。而吴隽教授等所编著的这本《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却能不落窠臼,特点鲜明。在研究方法方面,该书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在研究内容方面,从官窑文化现象入手,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例如,从史料的角度,通过系统的文献资料调查,全面考察了我国古代官窑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模式的发展脉络,及当时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背景;从材料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我国明清历代官窑制品的制作工艺(包括坯釉配方、原料处理、成型技术、烧成制度等)和性能进行系统分析和测试,深入剖析了明清官窑制瓷技术的突出成就;从社会、

经济的角度,通过和我国民窑的对比分析,总结和归纳出明清陶瓷官窑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及其对行业和区域经济、文化、技术的影响,并充分发掘其当代价值。

总体来说,该书对我国明清官窑文化价值体系的系统研究和深度揭示,不仅将补充完善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发展史,而且将进一步丰富中国陶瓷文化的内涵。此外,作为一种超经济的文化现象,中国明清官窑文化对促进当时的陶瓷行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这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属性的深入研究将让我们明晰利弊,从中汲取养分,为丰富和创新我国当代陶瓷技术品类,培育有中国特色元素的现代陶瓷制品,传承和弘扬古代优秀陶瓷文化遗产,振兴现代陶瓷产业,以及增强我国陶瓷的国际行业竞争力提供科学素材和参考依据。

郭杰忠

2016年5月

序

II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前　　言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郭沫若先生在1965年考察景德镇时以此诗句盛赞千年瓷都的历史和文化。景德镇瓷业始于唐，盛于宋，但其瓷都地位的形成，与明清时期御窑(器)厂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关系。御窑(器)厂所包含的追求完美的精品意识、组织严密的管理制度、精致的分工和协作，给整个陶瓷行业和该地区的瓷业发展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也进一步推动了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制瓷中心，也成为景德镇仅以单一手工业就支撑了这座城市长期蓬勃发展这一奇迹产生的主要推手。

景德镇的千年瓷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御窑(器)厂，长期以来是陶瓷考古等领域学者和专家们关注的焦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官窑模式与产品的自身属性、特点的解剖研究方面。包括：(1)从官窑制度方面，学者们从官窑系统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用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揭示和分析，代表性的有王光尧、刘毅等所著的《中国古代官窑制度》《明清陶瓷官窑制度比异》和《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等专著和论文；(2)对中国明清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的展现，代表性的有熊寥、潘文锦、蔡路武等所著的《明代官窑艺术》《明代各期官窑青花瓷的特点》和《清代历朝官窑瓷器概观》等；(3)科技界对明清官窑瓷器技术内涵方面的探析，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等单位为代表，发表了大量的科技论文，如《清代官窑瓷器的透明釉成分分析研究》《宣德官窑青花瓷的面扫描分析》等。此外，对中国明清官窑与当时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也展开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如彭涛、付火水、梁森泰等所著的《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明中后期社会变迁与景德镇陶瓷生产》《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等论文和专著。

但是，针对这种全新的官窑模式所催生的文化价值体系，仍然存在许多悬而不明之处，亟待深度发掘和探析。如，中国的官窑模式何以在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全新的明清官窑模式所催生的陶瓷文化体系，它的核心文化价值内涵是什么？对中国制瓷行业和地区的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当代我国陶瓷行业的发展，有何可借鉴之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江西陶瓷文物遗存保护暨御窑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下，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本书即是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由吴隽、张茂林、李其江、黄胜辉等共同编著，各章节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吴隽、张茂林；

第二章：吴军明、曹建文、吴隽；

第三章：李其江、黄薇、吴隽；

第四章：陈世伟、黄胜辉。

由于本书涉及考古学、科学技术史、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且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内研究硕果累累，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或遗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 ① 第一章 中国明清陶瓷官窑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 第一节 官窑的概念及早期官窑概述 / 2

一、官窑的相关概念 / 2

二、早期官窑概述 / 4

### 第二节 明清官窑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和原因 / 7

一、景德镇及其周边的瓷业资源 / 8

二、明代之前的景德镇瓷业基础 / 9

三、明清景德镇官窑建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15

四、明代景德镇官窑概况 / 25

五、清代景德镇官窑概况 / 31

## ② 第二章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和民窑体系的关系



### 第一节 官窑与民窑体系的差异性 / 40

一、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的差异 / 40

二、资金来源及匠役制度的差异 / 45

三、生产及用瓷制度的差异 / 49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景德镇官民窑的共性特征 / 55

一、官民窑共存的发展模式 / 55

二、官民窑均具有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 / 56

三、官民窑均具有精细的分工和规范的程序 / 57

### 第三节 明清时期景德镇民窑对官窑发展的贡献 / 58

一、景德镇民窑悠久的制瓷历史和优秀的制瓷技艺使官窑最终落户于此成为可能 / 58

二、民窑为官窑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创新 / 59

三、民窑为官窑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条件 / 62

目  
录



四、民窑是官窑的有力后盾和补充体 / 63

第四节 明清时期官窑模式对民窑发展的影响 / 64

一、官窑对民窑发展的不利影响 / 65

二、官窑对民窑发展的促进作用 / 68

### ⑦ 第三章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对瓷业技术及区域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对瓷业技术发展的影响 / 78

一、匠籍制度的变革对瓷业技术的影响 / 78

二、官窑管理方式对瓷业技术的影响 / 82

三、皇权对瓷业技术的影响 / 144

第二节 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157

### ⑯ 第四章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反思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的实质 / 164

一、文化的内涵 / 164

二、制度文化 / 165

三、明清陶瓷官窑文化概述 / 166

第二节 明清时期官窑文化的优秀元素 / 168

一、以创新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 168

二、追求完美的精品意识 / 183

三、组织严密的管理制度 / 184

四、精致的分工和协作 / 185

第三节 明清陶瓷官窑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反思 / 186

一、当代中国陶瓷行业的发展现状 / 187

二、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对当代中国陶瓷行业  
发展的启示 / 195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7 人名索引

221 书名索引

目  
录



# 第一章

中国明清陶瓷官窑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具有长达万年连续不断的陶瓷烧制历史,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陶瓷文化。除了磁州窑、耀州窑、钧窑、定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等众多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民间瓷窑体系外,官窑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明清时期专门为皇家从事瓷器生产的御器(窑)厂的设立,使我国古代官窑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 第一节 官窑的概念及早期官窑概述

### 一、官窑的相关概念

官窑是一个相对于民窑的概念。与民窑属于个人或家庭私有的手工作坊不同,官窑是一种封建制的手工工场制度,是由官府投资、计划生产、经营管理,并且产品由官府统一分配的窑业制度。因此,一般来说,陶瓷官窑是指由官府出资设立和生产,产品流向由官府控制的陶瓷器生产窑厂<sup>①</sup>。除个别特殊官窑产品,如所谓的“宣州官窑”流入市场外,官窑瓷器一般仅供皇室或贵族使用。由于使用对象的不同,相比于民窑瓷器造型纹饰的自由丰富,官窑瓷器在器型、纹饰上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且追求精工细作,不计成本。

文献中最早提到“官窑”一词的是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书中说:“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效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sup>②</sup>显然,此处文献所述的“官窑”特指北宋官窑。南宋时期“袭故京遗制”而建的性质相同的两窑,则分别被称作“内窑”“新窑”,并未以官窑称之。直至明清时期,官窑的概念逐渐扩大。明曹昭《格古要论》曰:“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sup>③</sup>,高濂《遵生八笺》曰:“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sup>④</sup>,已混用了“官窑”“内窑”之名。传统官窑的概念逐步形成,即由官府开设的,产品极其精细且专供官府使用,不再从事商品瓷生产的窑场<sup>⑤</sup>。

如前所述,官窑是指由官府出资设立和生产,产品流向由官府控制的陶瓷器生产窑

① 参见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② 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③ 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④ 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⑤ 参见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第150~154页。

厂。若官窑产品仅供御用，则此官窑可称为御窑。而一般概念的“官窑”，其产品有可能作为商品出售，如“宣州官窑”等。“宣州官窑”位于安徽省芜湖县东门渡村，窑址南北长3千米，东西宽1.5千米，其年代为唐末至北宋。该窑址未见于文献记载，1985年因文物工作者在窑址进行调查时，采集到钤有“宣州官窑”四字阴文印记的四系罐而大白于世。无独有偶，1991年安徽合肥市阜阳南路拓宽时，发现一个筒形窖穴，出土了数件带“宣州官窑”款的四系罐。但“宣州官窑”的器物瓷质粗糙，制作不规整，釉色不均。显然，“宣州官窑”只是由地方官府控制的生产粗糙酒器的窑场，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为宫廷烧造御用瓷的瓷窑<sup>①</sup>。

谈到官窑，就不得不提到“贡窑”。一般来说，宫廷获取御用瓷器的方式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官窑生产<sup>②</sup>。但在此之前，“土贡”是宫廷获取御用瓷器的主要方式。“土贡”一词出自《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所谓“土贡”，是指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向中央和统治者进献土特产或珍宝等财物的制度。瓷器也是各地方政府进献朝廷的重要产品之一，这在许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如，唐杜佑《通典》卷六：“河南府贡瓷器十五事”，《元丰九域志》卷二：“邢州钜鹿郡……土贡绢一十匹、瓷器一十事”，《宋史·地理志》：“信德府……本邢州。贡绢、白瓷、解玉沙”，《元丰九域志》卷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元丰九域志》卷三：“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会要辑稿》：“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sup>③</sup>，等等。这说明唐宋时期，邢窑、耀州窑、越窑及景德镇窑等皆曾烧制贡瓷。由于地方郡县土贡大多是由官府出资收购的，这些由官府出资收买的贡品，一般是由特定的匠户生产。为了保证贡品的质量，晚唐时越窑辟有专烧贡瓷的窑场——“贡窑”。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贡窑”铭墓志罐，高19.4厘米，口径9.7厘米，器身筒形并有圈足，罐外刻志文，其铭曰“府君凌倜，……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其坟丙向”，则较为明确地指明了上林湖越窑的“贡窑”性质。实际上，越窑早在东汉时期即已烧造出了成熟的青瓷，如上虞小仙坛的部分青瓷残片，其烧成温度已达1300℃，显孔气率和吸水率分别低至0.62%和0.28%，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sup>④</sup>。发展至唐代，作为南方青瓷体系的著名代表，越窑青瓷作为土贡产品进奉朝廷

<sup>①</sup> 参见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第150~154页。杨玉璋、张居中：《宣州窑及相关问题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8~21页。

<sup>②</sup> 参见赵宏：《“官搭民烧”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第81~85页。

<sup>③</sup> 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sup>④</sup> 参见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吴隽、罗宏杰、李其江等：《越窑、龙泉及南宋官窑青瓷等我国南方青釉名瓷的元素组成模式和显微结构特征研究》，《硅酸盐学报》2009年第8期，第1408~1414页。

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晚唐五代人王仁裕(880—956)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唐朝内库收储优质青瓷的情况：“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各自暖杯。”而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明确了越窑曾向唐朝廷贡献优质青瓷的史实。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秘色瓷十余件(见图1.1)，主要造型为盘、碗、净水瓶等。釉色可分为青绿、青黄两种，造型精巧，碗、盘口沿多作成花边状，底卧足满釉，仅留细小的支烧痕迹。这批器物质地优良，它们是越窑为朝廷烧造的贡品，后又由皇室供奉佛骨真身舍利随葬。法门寺地宫封闭的时间为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秘色瓷进贡不会晚于这个年代<sup>①</sup>。

贡窑是当时生产贡瓷的窑场，但贡窑除生产贡瓷，也生产商品瓷。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或许说明贡瓷户完成官府摊派的贡瓷定额之后，才可将瓷器自由出售<sup>②</sup>。当然，与后来的官窑乃至御窑相比，首先，贡窑是私人经营；其次，其产品具有商品性。

## 二、早期官窑概述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第一个仅烧制宫廷用瓷的官窑应是五代后周的柴窑。明代文献《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将柴窑瓷器列首位。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sup>③</sup>清代朱琰《陶说》中记载：“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柴窑器的特征，但在传世的官窑瓷器中无一件可以认定为柴窑产品，柴窑窑址至今也未能确认。它是否存在以及窑址位于何处，目前还有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景德镇的影青瓷就是柴窑瓷器，也有学者认为陕西的耀州窑即是柴窑，如此种种，皆无定论，因而其烧造制度更是无从考究。

宋代是官窑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宋代的官窑有汝官窑、钧官窑、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以及郊坛官窑等。



图1.1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秘色瓷净水瓶

① 参见刘毅：《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第90~94页。

② 参见郑嘉励：《越窑秘色瓷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第121~125页。

③ 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及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判断,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的天青釉汝瓷与清宫旧藏传世汝瓷器一致,因此清凉寺窑址应是北宋汝官窑<sup>①</sup>。但从清凉寺汝窑发掘出土的器物显示,除天青釉汝瓷(见图1.2)外,清凉寺汝窑还生产豆青或豆绿色印花瓷、白釉珍珠地划花瓷、白地黑花瓷等等,而从地层来看,该窑场历经北宋早、中、晚以及金、元时期。因而,此窑应是在私营窑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晚期被官府选中征用并由官府介入烧造事宜的一处官、民窑炉并见的窑场<sup>②</sup>。清凉寺汝官窑生产的瓷器并未被宫廷完全垄断,正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唯供御检退,方可出卖,近尤难得。”<sup>③</sup>这与后来专供御用的官窑场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在生产御用瓷时,同样追求精工细作,不计成本,甚至以玛瑙为制釉原料之一。玛瑙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其对瓷釉性质的影响与普通的石英应无差别,在瓷釉中引入玛瑙这种物质,无非是为了显示皇家地位的尊贵。

南宋叶寔《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sup>④</sup>即后世所谓的“北宋官窑”。由于没有其他可靠史料佐证,特别是窑址始终没有发现,因而学术界对于北宋官窑是否存在、窑址位于何处等问题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其窑址位于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但由于宋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开封屡屡被淹,昔日北宋的都市已深埋地下,因此窑址恐难以发现<sup>⑤</sup>。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封附近没有制瓷必需的瓷土和燃料,不具备建窑的自然条件,因而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sup>⑥</sup>。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北宋官窑存在,窑址不在汴京,而是在汝州,有学者认为汝州张公巷窑即是学术界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sup>⑦</sup>。

如前所述,《坦斋笔衡》中同样记述了南宋官窑的情况,明确指出南宋沿袭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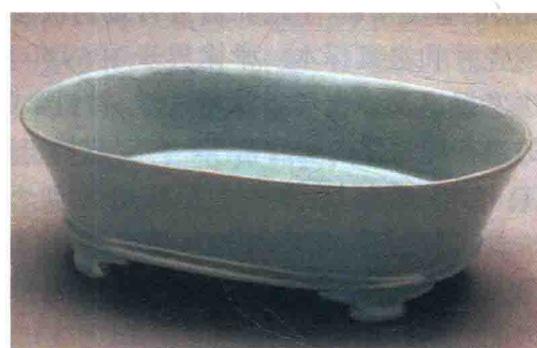


图 1.2 宋汝窑椭圆天青水仙盆

<sup>①</sup> 参见郭木森、赵文军:《试析汝窑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第94~98页。王光尧:《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1期,第50~58页。

<sup>②</sup> 参见郭木森、赵文军:《试析汝窑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第94~98页。

<sup>③</sup> 周煇:《清波杂志》,《笔记小说大观》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333页。

<sup>④</sup> 熊蓼、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sup>⑤</sup> 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sup>⑥</sup>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⑦</sup> 参见李刚:《宋代官窑续论》,《东方博物》2006年第2期,第6~17页。

旧制，先后在修内司和郊坛下设窑烧制御用瓷器。郊坛下官窑发现于1913年。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清理出龙窑两座、作坊一处以及大量的瓷片和窑具标本。学术界于1969年发现了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经近年来的两次发掘以及多位学者从考古学、材料学等角度的分析研究，证实了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遗存即是修内司官窑<sup>①</sup>。高宗赵构于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杭州），之后5年（1143年）建郊坛，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由于在仓皇南迁的过程中宫廷珍器已被金兵洗劫，因此祭祀用器只能从简。《咸淳临安志·郊庙》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因此，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的需求，迫切需要建置官窑，即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sup>②</sup>。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三月丁卯，行都大火，燔尚书省、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赦料粮院、亲兵营、修内司，……时省部皆寓治驿寺。”修内司官窑应毁于这一次的火灾，因而在郊坛下别立官窑，以代替焚毁的修内司窑<sup>③</sup>。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要严格按设计生产，而且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稍不合格，即须就地打碎重新烧造。官窑窑场大量的废品残片堆积，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宋代的几处官窑，都设在京城附近。至于文献中记载的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已经找到窑址的郊坛官窑，更是直接设在了京师。从汝官窑到京城官窑的发展，不仅是地理方位的转移，而且反映了宫廷对官窑控制的进一步加强。为了保证皇宫用瓷的质量和产量，宋朝廷还专门派人管理官窑。从文献记载来看，将作监、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有可能是中央官府管理官窑的机构。

宋朝倡导尊重儒术，礼教孔子，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巩固统治政权的指导思想。从宋初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赵匡胤御批《三礼图》开始，宋朝统治者将“尧舜之典”“夏商之礼”这种宋代理学的拟古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思维灌输到宫廷官窑瓷的器型设计中。于是，商周秦汉青铜礼器和玉器造型成了宋代官窑器型设计的典范，形成了宋代官窑瓷独特的器型设计风格。特别是宋代官窑陈设瓷的器型设计，基本上是仿商、周、汉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整个陈设瓷器型设计古朴，造型外观洋溢着一种古制的遗风，给人以庄重、自然的复古感<sup>④</sup>。宋代官窑瓷器以天青色为主流釉色，由于呈色元素含量、烧成温度高低以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宋代官窑瓷器还常呈现出豆青、粉青、虾青、月白等釉色。汝窑与钧窑的青釉瓷在外观上相近，历来有“汝钧不分”的说法。通

① 参见李家治：《简论官哥二窑》，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27页。

② 参见李辉柄：《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4期，第33~37页。

③ 参见邓禾颖：《南宋官窑探微》，《东南文化》2003年第5期，第69~72页。

④ 参见叶宏明、叶国珍、袁敏智：《宋代官窑瓷器型风格与特色》，《中国陶瓷工业》2005年第10期，第13~16页。

过科技研究发现,汝瓷和钧瓷在瓷胎的主量和痕量元素含量上差异不大,但二者瓷釉组成明显不同。与汝瓷相比,钧瓷瓷釉  $\text{Al}_2\text{O}_3$  含量低而  $\text{SiO}_2$  含量高,满足了分相的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分相析晶乳光釉,古人在不明其原理的情况下,称之为“窑变”<sup>①</sup>。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器物在一些外观特征上受了汝官窑等的影响,但南宋官窑瓷器与汝官窑器在胎体化学组成上大有区别,如老虎洞窑南宋堆积层瓷胎标本中  $\text{SiO}_2$ 、 $\text{Fe}_2\text{O}_3$  和  $\text{K}_2\text{O}$ (分别为 66.15%~70.11%, 2.41%~2.92%, 1.93%~2.86%) 的含量都比汝窑瓷胎中的这三种氧化物(分别为 60.51%~64.81%, 2.08%~2.28%, 1.53%~1.84%) 含量要高;而老虎洞窑瓷胎中  $\text{Al}_2\text{O}_3$  和  $\text{CaO}$ (分别为 22.86%~25.81%, 0.10%~0.14%) 都比汝窑瓷胎中的这两种氧化物(分别为 27.62%~31.27%, 0.49%~1.55%) 含量要低。这是由两地所产的原料所决定的,窑工们是无法承袭的。二者瓷釉组成虽有差异,但差异相对较小,化学组成点都位于  $\text{SiO}_2$ — $\text{CaO}$ — $\text{Al}_2\text{O}_3$  三元平衡相图中的钙长石初晶区内或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区域内,有利于钙长石晶体的析出以及随后在晶间以及周边分相的发生。这说明宋室南迁后,为了“袭故京遗制”,在杭州建立的第一座官窑老虎洞窑的窑工们,利用杭州地区所产的原料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烧制出与汝窑瓷相似的、玉质感极强的析晶分相的乳浊釉。除了原料配方外,南宋官窑都是在南方特有的龙窑中烧成,而汝官窑是在北方常用的馒头窑中烧成,窑形的不同,势必会影响窑内气氛和温度的控制,进而影响胎、釉的颜色和裂纹的形成。老虎洞窑出土南宋地层的瓷片,在元素组成上较为分散,反映了其作为南宋建立伊始的首个官窑,由于原料和工艺的变化,探索烧制类汝官窑的过程。而后来建立的郊坛官窑,其瓷器的元素组成相对集中,说明此时配方已较为成熟<sup>②</sup>。

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两方面的资料来看,北宋汝官窑和南宋修内司、郊坛官窑已经具备了官窑的性质,官窑烧造制度基本确立,也为明清时期陶瓷官窑制度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第二节 明清官窑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和原因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一枝独秀,更是生产皇室用瓷的御窑厂所在地。虽然明初朝廷

<sup>①</sup> 参见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7 页。

<sup>②</sup> 参见李家治、吴瑞:《科技研究为官哥等窑的时空定位提供新思路》,《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 年第 4 期,第 39~48 页。